

讀錢著國史大綱

吳振芝

平日讀書有一習慣，最喜讀個人熟悉之作者所著，不僅如見其人，且覺較易領悟。諸書之中，尤以錢師賓四先生之國史大綱，以曾採爲主要教材之故，反覆究考，曾無一字之遺漏。今已多年不教中國通史，毋須爲準備功課而讀書，暇時再讀此書，更感自由快樂。柳子厚所詠「閒持貝葉書，步出東齋讀。」其樂吾得之矣，安能不爲記？

國史大綱之問世，既已三十七載，歌頌讚美，無待辭費。謹述研讀所感，就教於方家。

(一)此書以溫情與敬意爲基石，非冷冰冰硬心腸之學問。賓四先生有言：「凡人求學問應有意義，應對社會有任務。今日教授中國史，意義何在？任務如何？從此點出發，乃可知如何剪裁？何者宜繁？何者宜簡？」

先生著此書之意義如何？任務何在？其答案即見於國史大綱第一頁：「凡讀本書，請先具下列諸信念」。余授此書，必命學生就此諸信念，逐一思想。尤其其中之附註小字，較之大字更爲重要而深刻。此四條信念，不特爲讀此書者所應有，實爲讀一切國史者所應有也。

此種信念，賦予冷冰冰之知識以生命之活力，故全書洋溢溫情與敬意。溫情者，不熱狂，故和暖而理智；敬意者，不虛僞，故真切而平實。

(二)此書乃教學累積自然之成果，非爲著書而著書。

此書乃積數十年教學之經驗心得，尤其自二十二年於北京大學教授中國通史以來，教學方法，教材選擇，屢經修改，直至抗戰緊張，空襲時至，積稿有焚如之虞，始不得不刊布之。故此書之形成，由來已久，而其刊布，則適應時勢耳。

(三)此書所說，乃作者所真瞭解、真相信，自己未嘗真信者不書也。

例如第一章：中原華夏之發祥。既未侈言三皇五帝，亦不肯說東周以前無史；而只從「史前遺物之發掘」與「傳說神話之審訂」兩題說明，其去取之慎重顯然。

(四)此書雖仍是按朝代敘述，但抓住了時代之特色。

例如於西周，稱之為封建帝國之創興；於秦，稱之為統一政府之建立；於明，述其傳統政治之惡化；於清，認為部族政權之再建；研究中國史，勢不能不依朝代之次序，但如僅僅標明朝代，如秦漢隋唐宋元明清，並不能予學子以如何之印象；今同時點出其時代之特色，乃有畫龍點睛之妙。更有進者，從此一時代之特色，嬗變而為另一時代之特色，則文化之動態亦栩栩然出焉。

(五)此書最精采處，在有若干之發明。

即如「士人政府」一語之道破，乃作者自創名詞。他如：中國社會演變之剖視，近代中國病態之溯源與分析，皆為別具隻眼。

(六)此書之序文，實為作者研究國史之結論，宜三致意。

然則此書竟無可批評乎？應之曰，天下無無可批評之書，特我之學識，不足以批評之耳。然亦嘗聞他人之批評矣，試為之解釋如下：

(一)或謂國人研究國史，頗不易為持平之論。不曰：中國二千年專制，較之西洋，落伍已極；即曰：中國事事皆有道理；賓四先生似屬後者。此說我略有意見：

(1)賓四先生自述其研究國史之動機，由於幼時見報章雜誌論中國是否會亡國之問題，心至疑懼，因立志於中國史中，尋求答案。可見先生之學史，不僅始於幼年，且係從一問號開始，並非先有如何之學識，先立如何之史觀，而後使歷史為之註腳者。其後經過博覽深思。得此「中國有理」之結論，乃客觀之學術議論，非盲目之感情用事。縱謂其所主張，未必

人人同感，然其治學之方法，固無憾也。

(2)說中國有理，並非說事事皆好；說中國有理，亦不等於說外國無理，其理甚明。書中說中國不好，外國好之處甚多，無待列舉。

(二)或謂此書未註出處爲遺憾，誠然。但雖未註明出處，實則語語有來歷，凡於國史有根柢者，俱可尋繹得之。須知作者著書之時，敵機肆虐，每週抱稿入山中寺廟三日，全恃筆記成書，豈能如今日可以從容圖書館中翻閱原著，記其卷頁哉。故此書未註出處誠屬微瑕，至今觀之，反爲抗日苦戰期間書生報國艱苦之反映也。

回憶三十年七月七日至八月三日，教育部於重慶西北之青木關，舉辦史地講習會。時青木關已廢而不用，雜草蓬茸，行人稀少，反成敵機轟炸聲中避秦讀書之地。會中學者雲集，賓四先生與焉。其時國史大綱甫於前一年六月付梓，先生蒞會時，並未出示其書，但述著書原委，論讀史心得，並表明對抗戰勝利之信心。故國史大綱最後一章最後一項僅一題目：「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」。此則我等今日共同努力之目標矣。